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昌凤.建构中国当代底层叙事的物质性维度[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2):107-113.

建构中国当代底层叙事的物质性维度

王昌凤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随着底层写作到底层叙事概念内涵的变化,底层从一个事实性存在转变成为一个事件性存在。底层叙事中人与物的分离书写,以及由虚构性生产导致的虚假性认同和由现实性忠诚导致的想象阉割,限制了它在接受中的积极认同。物性书写的匮乏与超越性存在的缺失,是底层叙事在创作上的局限。对底层叙事的主体性、当下性和永恒性三个问题的追问,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叙事还原为物、忠实于物和开启于物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现实性;虚构性;物质性;底层写作;底层叙事

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2-0107-07

自 2004 年《天涯》发起“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题讨论后,底层写作迅速成为文学讨论的热点。一直以来,对该问题的追问依然没有偏离学界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对没有经典代表作品,学界表现出无力的匮乏感;另一方面,是人们在一波又一波的底层叙事影视奇观中,感受到这个时代来自底层的生命呼吸。2022 年一部讲述小人物底层生活的《人世间》成了全民猛追的热剧。剧中相比于大哥的出人头地,二姐的文艺浪漫,小弟弟一地鸡毛困顿琐碎的平庸生活显得温暖而实在。随后开启 2023 年全民热议话题的,又是一部讲述鱼贩子成长经历的《狂飙》大剧。央视网评《狂飙》:“许多人喜欢高启强,并不是认同他的坏,而是在他的身上,看见了同为普通人的自己。”作为底层人,高启强饱受压榨,明明努力生活却很难翻身,剑走偏锋以命相搏,刹那辉煌却终归沉寂。他作恶多端却依然向往着善良。高启强做了很多人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太多人不忍于他的被正法,以至于这个事件又成了所谓 be 美学的典型案例。正如人民网所指出的:“以恶拷问人性,引发对善的反思,给坏人的故事留出足够的创作

空间,这是文艺创作的进步。”从接受层面来看,底层叙事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日常生活浅层表象的书写,而成为读者和观众反观自我、反思存在的一种方式。底层的平庸、底层的恶通过叙事,已经形成了超越于社会学意义的美学张力和文学价值。本文借助物质性相关理论,通过探讨底层叙事的基本维度,以反思当前底层叙事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其发展的可能性。

一、凸显作为物的事件性:从底层写作到底层叙事

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个问题更多地是用底层写作来表述的。一般认为,底层写作就是以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写作方式。2006 年《小说选刊》改版,宣布以“文学作品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作为该刊选文的宗旨。这概括了底层写作的基本特点。底层写作从材料选择到人物形象的塑造皆有生活原生态的特点,非常接近现实,表现出对底层生存状态的深刻同情与理解。底层文学多写城市边缘人、外来者的经历和乡村生活的简朴与困顿等。同时,底层写作比较自觉地反映

收稿日期:2023-1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物质性诗学的中国形态研究”(20BZW004)

作者简介:王昌凤(1980—),女,湖北荆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

社会问题,甚至流露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社会疗救的意愿,如频繁发生的矿难故事在底层写作中就有较多表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总体而言,这些作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血性与悲悯、揭示与深情、哀怨与抗争,否定与期待、抵制与救赎、批判与启迪构成了他们作品的经纬,他们的作品在深刻揭示时下生活的缺陷与问题时,也向社会、向人生传递了一种温馨的祝福,它们用爱与真诚守望着小说的尊严。”^[1]底层写作至少表明了作者面对现实的两种写作姿态,即“为底层写作”和“作为底层的写作”(莫言语)。莫言就曾声称自己是“作为底层的写作”,其实这样说也没有必要。学者张清华说:“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写作的,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和条件去写作。”^[2]他进一步解释道:“莫言的说法的潜台词是要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到他们的心声”,所以他“在事实上仍然愿意将其看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另一种形式”。^[2]可见,如果在“作为底层的写作”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底层写作的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上层人也可以写出好的底层文学作品,而真正的底层人大多又是不会写作的。“为底层写作”本身就有强势话语的元素在里面,即便写作主体具备了写作条件,写出来的作品仍然只是主体心目中的他者,与他者本身是有根本区别的。所谓底层写作也不过是作家的一块招牌,是作者虚构现实的手段,只不过它更多地强调作家面对现实的一种平民态度而已。

基于此,本文倾向于用底层叙事来表征这一近乎相同的对象,原因有两点:其一,希望超越文学文本,结合影视艺术等,在一个更广阔的文本空间来谈这个问题;其二,突出叙述对象本身的不稳定性。与底层写作强调叙述主体的立场和倾向不同,底层叙事更突出书写对象的事件性特征。底层不是指向某个特定的群体,而是对某种特殊生存状态的概括,因此底层本身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底层叙事更强调对底层的建构性,即如何以生活浅层物的表象来建构底层生态的生存意识。在这里,诸如什么人在说、为谁说等问题都被悬置了,重要的是如何说以及这样说所达到的效果。在底层写作到底层叙事概念内涵的变化中,底层从一个事实性存在转变成一个事件性存在。底层叙事也不再局限于对底层生活状态的揭示,而更关注底层生态的建构,且这种

建构是通过叙事重新建构物的秩序来完成的。

二、人与物的分离:底层叙事的三个基本维度

从现有的影视作品和文学文本来看,底层叙事有三个主要的叙事维度。

其一,现实主义观照下的底层再现,即强调客观冷静地还原底层本真,肯定书写底层真实的必要。自然还原一般有两种方式:其一,追求以亲历者身份呈现当下生活建构价值和意义,以时间本身的发展呈现底层生态;其二,罗列日常琐事解构价值和意义,以作者的情感零度呈现底层,通过选择、梳理和组合呈现本身的无意义,以记录、新闻报道等方式呈现出非虚构性特点,不批判恶也不揭示善,只展示人性善恶发生的环境和路径。比如贾樟柯的《小武》《站台》《三峡好人》《天注定》等以人物为第一视角,以纪录片的方式提出社会问题,直面人生和社会的阴暗面。对这类创作,学界普遍评价不高,认为其缺乏艺术性。如学者洪志纲就指出:“这类写作具有严重的模式化、粗俗化和平面化的审美倾向”,缺少“精神质感”。^[3]这类写作普遍的特点是凸显生活物性的一面,更多地展现对物表象的观察或者臆想。因为缺少人的感受和发现,其对物存在超越性的一面思考不够,而只是简单地按照对象的属性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

其二,人文主义关怀下的底层围观。这类叙事主体往往带着极大的悲悯情怀关注底层生存,呼吁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倾注了极强的人文关怀。基于此,底层叙事成为作者表达人文关怀的重要手段。学者李哲指出:“作家对底层的所谓表述实质是利用自身的经验和想象力对底层的建构。这一经作家和知识分子自身建构的空间,不具备任何现实的指涉,它是承载作家自身道德情感和审美价值的虚构空间。”^[4]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就存在这个问题。作者在关于《那儿》的访谈中说:“在《那儿》里,我写了一个劳动模范出身的工会主席,他是没有话语权的,只会干活不会当官,却把自己对工人的承诺看得比天大。当然,他无力改变工人的命运,最后只能消灭自己。”^[5]可见,这种被虚构出来的底层经历,恰恰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让知识分子在其中去“同情”“悲悯”,利用虚构的底层空间化解了对自身道德的焦虑^[4],以大众经验来表达崇高的道德关怀。这样的倾向,导致底层叙事的文学性普遍不强,大部分作品存在社会学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道德价值高于艺术

价值等问题。作者这样写底层不过是借底层表达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本质上属于“一种非文学性冲动”^[4]。作家曹征路说:“我认为文学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部分,一个作家倘若对社会进步不感兴趣,对人类苦难无动于衷,是可耻的。只不过作家的参与方式是文学的,情感的,审美的,是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而已。”^[5]这类作品较多地展现了人对生活物性一面的思考,只是这种思考不是建立在对物的真实感受之上,而是表现出过强的主体性,按照作家情怀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忽视了物本身的属性。

其三,消费主义视阈下的生存奇观。这类叙事常有表演性猎奇性特点。作品比较集中地表现底层的粗俗、残暴、贪婪、愚蠢等。如李扬的矿难系列,阎连科的艾滋病书写,余华笔下的卖血事件,方方笔下的棚户区改造,池莉笔下的烦恼人生等。其中的某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将苦难传奇化、狂欢化为供人消遣的故事之嫌。“底层在消费社会就可能演变为一种另类的商品而被消费。每天都会有新的故事来取代旧的故事,人们同样可能在消费着不同于娱乐世界的底层世界的痛苦。在这个快速消费的社会,短暂的底层记忆就只能如商品的被消费一样慢慢退出人们的视线。底层的苦难根源得不到有力突显反而会被淡化甚至掩盖”,“当底层成了被消费的商品时,那些被遮蔽的真实将被继续隐藏,社会的不平等也许愈演愈烈,而被消费的底层依然贫穷,汗水与泪水的悲剧还将上演。这是消费社会中研究底层问题时将面临的挑战”^[6]而真正来自底层的创作是怎样的呢?农民诗人、打工文学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农民诗人余秀华爆红事件,打工诗人许立志跳楼事件,都是底层奇观的伴生现象。《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样的标题出自一个脑瘫、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的底层女农民之手会给人怎样的想象?妥妥的被诱惑加深刻的悲悯,但又有多少人会真的认真到把这样的写作当作是精致的文学呢?这类作品释放了主体性,也消解了对象的本真性,是按照市场需要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的。

可见,多数底层叙事存在的问题是,一旦把中间环节拿掉,人与物的关系就解体了。好的文学是以人的情感去开启物的存在,以物的存在唤醒人的情感。第一个维度局限于物本身,在其中,人的情感体验不够,再现成了光秃秃的装饰物。第二个维度强调叙事主体的情感性,但这种情感又不是建立在与物的对应关系之上,而是将情感标签式地贴在对象上,这样的表现很容易成为没有节制的情绪宣泄。

第三个维度与第二个维度强调写自己不同,它更重视写受众想要的。这样的叙事很容易成为对人与物关系的一种臆测。情感不是从物的对象上产生的,物的呈现也不能很好地揭示情感。从关注物的表层书写,到挖掘人的极端体验,再到对底层情感的消费,之中存在的问题是人与物始终是分裂的。文学应该以开启物的方式展现人的情感从而探索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开掘不够,读者因此与底层叙事作品产生了疏离感。

三、物化感受:底层叙事在接受方面存在的问题

底层叙事天然占据的一个道德高地就是为底层代言,因此叙事上的平民态度成为其普遍追求,但这种平民态度本质上带有很大程度的虚构性。其原因有两点。其一,作家笔下的底层,其实是被作家单方面想象出来的底层。“通常情况下,作家笔下的底层社会是虚构的(比如《檀香刑》《许三官卖血记》),虚构的底层社会,当然不是真正的底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底层社会已经被作家轻慢、玩弄、扭曲,也即通常所说的被美化或丑化了。换言之,文学的虚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底层叙事。”^[7]底层叙事与其说是对底层现实的发现,不如说是对底层的臆造。作家描摹此类底层时,要么是与生活贴得太近表现为残酷与血腥,要么是将底层理想化为宁静质朴未开化之地。作家的这种描写非但没有揭示底层,反而是对底层的遮蔽。作家是很难以一个真正平民的视角来写作的。当他是一个平民的时候,他没有戳破现实的能力去写作。当他有能力写作的时候,他面对的生活也早就发生了变化。所谓以平民的视角来写,顶多是对过往底层生活经历的回忆,而任何回忆,尤其是这种忆苦思甜的回忆,都带有被放大的特点,因此所谓底层叙事,从作家精神上来讲也是不可能的。其二,对底层人物的扭曲。以往对底层尤其是底层人物的简化是底层叙事共同存在的问题。底层人物作为一种类型在底层叙事中多被脸谱化了。他们要么是表情呆滞、灰头土脸、安贫守穷的模样,要么就是安静单纯总是一脸白痴的样子;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困境也多是贫穷、落后和愚昧等。底层人物几乎没有什么个性,很多只是充当道具,只是一群等待被拯救被救济的对象。于是,在作家的笔下,围绕底层人物的悲惨故事就变成了新的消费品。底层叙事在揭示苦难的时候,又把苦难推到了展台上,成为供人取乐的消费品。因

此,所谓“为底层叙事”很可能沦为一个骗局,打着为民请愿的口号,实则对那些无聊闲人穷途末路的声色之欲又打开了另一扇门。可见,多数底层叙事无论是从表现形式还是艺术精神上讲,都是对现实的说谎,都是绝对的虚构性生产。这种背离现实的虚构性生产只能令人产生虚假性认同。电影《八角笼中》揭示了底层生态的物化特点,但其中人的存在却抽象而无力,整个影片尽管讲得很用力很煽情,却缺乏动人的力量。

与虚构性生产导致的虚假性认同同时存在的,是由现实性忠实导致的想象阉割。学者李敬泽曾说,这几年文学大奖几乎都是“村里的事”,可仔细想想又有几个“村里的人”是活在读者的心里呢?如学者牛学智所说,“它们(‘底层写作’)是说事的文学,而不是写人的文学。”^[8]底层叙事存在过于忠于现实而缺乏想象力的问题。首先,多数底层叙事放弃了对人对终极的追问。它们关怀生存多于关怀人性,不着力于刻画有性格的人,也很少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文学应当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来刻画人物,表现出生命的两难处境,而不是解决问题或者抚慰挫败的英雄。其次,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看破现实的智慧。如今宏大叙事常常被人们刻意回避,但“正如萨义德说的中东还需要宏大叙事,我们这个民族也需要宏大叙事。我们不仅需要底层生活体验,我们更需要对底层生活的高屋建瓴的观照”^[9]。大部分底层叙事太致力于展示生活的原生态,缺乏崇高精神的关怀,没有将底层生存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审美价值层面。当前多数底层叙事都存在就事论事,甚至有把大事往小里写的倾向。表面看来,作家站在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写了很多底层的悲惨故事,但底层的存在感却越来越弱。作家认为底层该有的和底层本身就有的的是两回事。底层叙事的优势不在于写了底层或者为底层说话,而在于尽可能地揭示出底层的本真状态。对文学而言,有些感受是不分底层上层的。写底层最重要的是要写出底层的特殊性,写出人只有在那样的境遇里才可能干出的事儿和生出的想法,写出那一刻的超越性感受。有学者批评贾平凹的《高兴》是顾影自怜的游戏,我以为是十分准确的。据我所知,在目前现有的生活水平和物质条件之下,还很难找到像刘高兴这样的城市拾荒者,他与我们的生活实在是离得太远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理解作为一种反讽,但这样的反讽在真的苦难面前多少有些荒诞和局促。文学可以表达出另一种真实,即在每个时期人性发展的丰

富性和人类精神发展的可能性。底层叙事也是虚构的现实,应该生出高于现实的力量。倘若新闻写得像小说而小说又写得像新闻一样以至于真假难辨,这就说明文学创作太接近现实了,丧失了对现实的引导作用。如艾布拉姆斯所说,文学除了要像镜子一样揭示现实生活的真相外,更要像明灯一样照亮人们的现实生活。对此,王晓明先生进一步指出:“眼前的这个全世界人没有领教过的巨大而艰难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的压迫和挑战,给了文学取之不竭的活力,刺激我们的作家瞪大眼睛直面人世,用自己的笔,狠狠地戳破这现实。”^[10]

当代某些底层叙事缺乏的并不是关怀现实的决心,而是戳破现实的能力。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身体虽然脱离了现实,但超越性的现实体验和经历却都不够,与现实没有距离使创作表现出拘泥于现实的就事论事。好的创作应该是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脱离了与现实的利害关系之后的写作。如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所说:“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就做哀悼诗呢?不会的。谁在这个当儿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当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感受的极端灵敏程度有所下降,灾祸已经远离,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事人才能够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够估量他蒙受的损失,记忆才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过去的甜蜜的时光。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做出好文章。他说他伤心痛哭,其实当他用心安排他的诗句的声韵的时候,他顾不上流泪。如果眼睛还在流泪,笔就会从手里落下,当事人就会受感情的驱谴,写不下去。”^{[11](P305~306)}当我们让自己沉浸在现实中的时候,写作很难绕开功利的思考,而文学更多的是追求超越。因此,我们在进入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以艺术家的审美的眼光来看身边的人和事。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举过一个例子:“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12](P161)}可见,人们对于对象的感受,切入的视角,决定了感受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写作尤其如此。对文学写作而言,仅仅只是从审美的角度感受到对象还是不够的,文学要写出对象可能发展的方向,还要写出此在生

活的未来趋势,这就必须凭借虚构。鲁迅先生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需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着,何以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预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13](P198)}即便是标榜纯写实的底层叙事,合理使用虚构依然是其价值得以体现的必要方式。虚构创造了人类精神的第二生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延伸了人的感性生命。一部分底层叙事对生活物性真实一面的过于强调导致其缺乏想象力,而让我们产生美感的不是太过琐碎亦或太过真实的描写,而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唤起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创造。

四、物性书写:底层叙事的批判思考

底层叙事的发展现状表明,所谓底层的文学是不可能的,所谓现实的文学更是不能止于现实的。底层叙事所渲染的情绪与底层文化心理无关,它不过是借底层表达了精神上的优越感和崇高感。底层叙事流露出作家的伦理焦虑,这种焦虑赋予了作家某种使命甚至是权力,在这种焦虑下,真正的底层被改写被掩盖了。重要的不是为底层写也不是底层人写的,而是对底层存在本身超越性的揭示。作家只有放弃为底层代言的优越感才有可能真正看见底层。凝视而非窥视或审视,深深扎根于底层本身,与底层对话,回到底层生活物性的层面去发现底层,退出主体是第一步。主体的退出意味着霸权的退出,只有这样,物才成为真正的物。仅仅将主体的情感投射到对象上,只是再现和复制自己,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正是用虚构来超越自我的。作品如果只是局限于自我经验,只会形成倾诉和交流,就无法产生超越对象的力量。荣格说:“个人色彩在艺术中是一种局限性甚至是一种罪孽。”艺术家是更高意义上的集体的人。“只有走出自恋主义的作家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能够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读者才能通过对他者的观察和体验获得真理。”^[14]伟大的作家反而能够忘却自我或者说把自我藏得更深。中国自孔子以来的自省传统,使我们很难忘却自我而投入到另外一种生活之中去。很自然的,我们的创作多从现实经验和自我体验出发,太局限于自我会限制想象力的发挥,从而无法产生超越感。创作主体要首先从情绪的主体、理性的主体、世俗的主体中解放出来,努力建构一个大感性的主体,以这样的身份回

到物本身去发现底层。

底层被关注后该如何被表达出来?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结合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底层能说话吗”相关理论,证明当前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底层不仅可以被发现也可以被表达,甚至以此批评斯皮瓦克底层理论的局限性,但这可能是对斯皮瓦克理论的误读。现实是底层不是不能说话,而是底层话语不具备竞争力,底层身份也没有说服力。当前的底层可能面临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底层身份的社会认可问题。底层在对自有身份的厌弃与逃离中,多有实现阶层跃升的渴望,这是他们面对的生存现实。其二,底层话语的竞争力问题。底层面临的不仅是话语权贫困还是话语贫困。他们这个阶层的表达方式已经脱离了社会核心圈层,被逐步边缘化,他们自己也在寻求以另外阶层的表达方式来自我表达。他们上升的通道狭窄,赚钱快的工作大多需要以更多文化资本为依托,他们要突破的方式便是打破秩序做非法的闯入者,铤而走险甚至以命相搏。当然挑战秩序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伦理上都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这部分人的命运也是注定的:要么默默忍受苦中作乐,要么一时泄愤终身忐忑。底层并未分享能进入核心圈层话语的文化资本,因此其话语在阶层对话中是无效的。它只是被观看、同情、拯救、排斥的他者。对话的不对等导致其与其他阶层的主体不对等,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现在我们随便找一个底层叙事的文本来读,就会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多数作家太关注反映现实,太急于解决当下问题了!把解决现实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好领导、好政策或者好时机上,这不是文学的方法,而是最浅显的社会学的思路。文学故事不同于社会事件,它不要求现实地解决问题。我们不会期待作家能够改变我们现实的生存状态,但是我们会希望他给我们虚构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或者说设想出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文学不仅要记录时代的发展,更应该保存情感和预示未来发展的趋势。好的文学要让人在虚构中看到事情发展的必然性。对现实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是衡量艺术的标准,大部分作家往往强化有余而照亮不足。我们过分强调了文学现实主义的一面,古代的文以载道,现代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都是在强调文学关注现实,突出的是其社会功能。现代派文学又走向非现实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一面。因此,如何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寻找平衡点,并能更好地表现文学观照现实的特殊性,不仅是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也

是当代文学创作面临的困境之一。另一个现实是，我们难以超越现实的束缚，商业化和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电视电影的商业迎合使我们生活在物化社会中，精神容易疲乏。虚构和想象是人类走向精神的自由之路，是实现艺术拯救的重要方式，应该在文学观上得到重视。我们现实主义文学中存在着两种有问题的倾向：一种是太热衷于探询问题即外加的思想倾向，另一种是太不注重题材中所包含的问题即发掘不深。有些文学太强调文学干预现实的能力，似乎要将文学作为社会生产或革命的一种方式。很多作家太想在作品中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其实，解决现实问题并不是文学的使命，文学的使命在于保持对生命的期待与向往，激发人的存在体验。文学面对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而虚构和想象则能使其走得更远。对文学的分析不在于找到现实的对应物，而是从存在的意义上寻找一种接近不可言说的真实感。文学本身有解释和批评的作用，它本来就是梳理我们对现实的感觉，让我们看清现象背后的真实。文学应该是在忠于物的基础上发现物的超越性存在。

这种超越性还体现在对永恒的追问上。长时期以来，底层叙事始终只是呈现出表面的热闹，作品数量多，但影响有限。即便是收割了观众一波波热情的经过媒体处理的底层叙事作品，也只能在一阵阵热情过后被人遗忘。底层叙事呈现出从“精神幻像世界”到“世俗生存世界”^[15]的巨大转折，即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底层生存和底层文化心态。正如学者杜晓沫所解释的：“作家也在文化意识而不是纯粹的政治意识的支配下，更宽容、更驳杂地摄取底层的生活内容，文化意识的渗透使作家更深入、更公正地表现底层文化和底层心态的复杂性与独特性。”^[15]作者在底层叙事中逐渐退出，努力使小说返回事件本身。作者从“劝诫者”和“守护者”转向“旁观者”和“同行者”，尽可能隐藏主观价值判断，更理性地思考底层生态。这相对于以往的使命写作有非常大的改观。尽管他们关注当下的生存问题，但似乎刻意回避了终极意义、价值等问题，因而其作品最终很难成为经典。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作家陈源斌有一篇小说《万家诉讼》，讲的是农村妇女秋菊因丈夫被村长踢中要害讨说法不得而越级告状的故事。应该说，像这种写上访告状，揭露社会不平的作品是很多的，但好的作品是不止于控诉黑暗或者发泄情绪的。作家刘恒和导演张艺谋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电影《秋菊打官司》，改编后这个故事至少

呈现了三层内涵：“第一层是最外在、最肤浅同时又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层面：一个民告官的故事，一个普通百姓与小官僚斗争不服输的故事；第二个层面是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层面：一个受到损害的弱者维护自身尊严的故事，由此展开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影响，有时甚至发展到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方面去了；第三个层面是哲学命题的层面，涉及到对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的思索：世界上充满了利益的冲突，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都存在紧张的利益冲突，但人类为了生存，终究还是需要沟通、理解，化解紧张冲突。”^[16]显然电影《秋菊打官司》已经不再满足于讲一个让人愤怒或令人同情的底层逆袭的故事，而是努力发掘故事内涵的多重意味并倾注了哲学思考。《秋菊打官司》借一个小事件表现了人性的矛盾，人生的不可控以及人生意义的悖反性。人生于世一个说法有那么重要么？但一个说法都没有还活什么劲。但当我们拼尽全力争取到的这个说法到来时它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么？编剧用一个形而下的小故事建构了一个形而上的大思考，实现了对物的开启。

为了更好地开启于物，我们是否可以把故事的背景定位在公共空间，太过私人化伦理化可能会令人觉得这只是一个个案，很难让人由此生出全人类的普遍意义和价值。是否可以揭示人在物的面前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如《余震》写人在极端事件中的选择，以表现人性的深刻与复杂。是否可以多写一些具有普遍情感的东西，不要让一部小说去掉故事特殊的语境后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如慕容雪村把传销故事写成防骗宝典，纯粹以知识的方式消解人文话语，从而也就失去了文学性。底层叙事近些年的尤其是在影视剧方面的表现是很值得期待的。它们在切入当下，反思人性，追问永恒，隐藏主体性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我们有理由相信，后面或许还会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杜卫东.守望小说的尊严——《小说选刊》改版一周年答中国作家网记者问[J].小说选刊,2007(1).
[2]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J].文艺争鸣,2005(3).
[3]洪志纲.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化立场[J].探索与争鸣,2008(5).
[4]李哲.论底层写作的文学性[J].中国市场,2011(27).
[5]曹征路.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

[6]刘桂茹.底层:消费社会的另类符码[J].东南学术,2006(5).

[7]单正平.底层叙事与批评伦理[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5).

[8]牛学智.乏力的温情叙事——对底层文学及相关作家问题的几点思考[J].当代文坛,2008(3).

[9]杨光祖.底层叙事如何可能[J].时代文学,2008(3).

[10]王晓明.对现实伸出尖锐的笔[J].当代作家评论,2006(2).

[11](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M].张冠尧,桂裕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丹麦)勃兰·兑斯.19 世纪文学主潮(第 1 卷)[M].张道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3]鲁迅.鲁迅全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4]贺晓武.虚构诗学——以伊瑟尔文学思想为基础[D].浙江大学,2007.

[15]杜晓沐.飞入寻常百姓家——论“新写实”小说与传统写实小说的差别[J].理论与创作,2007(5).

[16]李秀金.文学生态语境中的话语隐喻——关于新写实小说的话语阐释[J].社会科学辑刊,2009(4).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Constructing the Material Dimens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Bottom Narration

Wang Chang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New Media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 With the transforming of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from the bottom writing to the bottom narration,the notion has changed from a factual existence to an event existence.The separation of people and things in the bottom narration,along with the false identification caused by fic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imaginary emasculation resulted from realistic loyalty limits positive identification in acceptance.The lack of material property writing and the lack of transcendence are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bottom narration in creation.A probe into the subjectivity,immediacy and permanence of the bottom narration will help to further explore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narration in three way: reduction to things,being faithful to things and open to things.

Keywords : reality;fiction;materialism;the bottom writing;the bottom narration